

張總筆一

四之獻文戰抗

版出社書國建東遼

一 筆 總 賬

抗 戰 文 獻 之 四

遼 東 建 國 書 社 出 版

1946, 7, 1,

抗戰以來日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

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

解放日報

六年多以來，國民無反動派在抗戰的烟幕下，進行對敵妥協投降的花樣和手法是很多的。首先就宣傳投降妥協的言論來講：有曲解中外歷史，側面「証明」「戰是誤國，降是愛國」，指奸爲「忠」，罵忠爲「奸」的，這是一種；有借口抗戰，暗中偷險的帶出投降來的，這又是一種；有口頭高呼抗戰，但故意強調抗戰的困難，宣傳甚麼「國際孤立」和甚麼「人心厭戰」，把勝利描寫得遙遠無期；或是相反，故意強調敵人的困難，說「日本天皇亟欲能戰言和」，「這是日本官方唯一正式計劃」，以達到宣傳中國必須投降或不妨投降的目的，這又是一種。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而一切投降妥協言論中，最有勢力的一種乃是模糊抗戰目標，偷偷摸摸的取消收復九一八以來一切失地的明確口號，而代以「犧牲到底」，「力量用完」，「國際條約生效」，「英美干涉實現，或「恢復抗戰以前狀況」等等曖昧的詞句以便以「敵國與國際情勢爲解決之賬本」，而隨時接受屈辱條件。其次，在妥協投降反動方式上，有公開投敵的，有暗中潛伏在抗日陣營作各種陰謀活動的，有不敢提出親日，只提出走德

意路線，以通過德意向敵人屈膝求和的，有邀請英美調解的。而一切活動中最厲害最險毒的一種是：實際與敵寇進行妥協，表面却打着抗戰旗幟，心裏想的，手裏做的，甚至口裏說的都是法西斯主義，但却假意戴着民主的帽子，以便欺騙更多的人民。真正的外交關係是德意日路線，外表上却打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並且竟至有人自捧為聯合國四大領袖之一。事實上是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然而表面上却粉飾着「聯共抗日」的假面具，以騙取盟國的軍火，迷亂國內外的視聽與麻痺國內外的警覺。最近一年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高級將領的大批投敵，吳逆開先的回渝活動，反共內戰的積極準備發動，花樣翻新，愈出愈奇，抗戰前途實堪憂慮！茲僅就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敵投降妥協活動的不完全的材料，綴表於此，希望全國同胞加以嚴重的注意：

一 「七七」事變至汪逆發表豔電主和

這一時期是國民黨抗戰的高漲，但即在此抗戰高漲時期，國民黨對內部大漢奸汪逆精衛等始終畀予重任，且仍不肯對日宣戰，並望隨時對日進行和議，以期結束戰爭。同時國民黨雖進行抗戰，而反共反人民的老政策仍未放鬆，各地民衆救亡運動均遭國民黨當局的嚴厲的統制，特務機關並乘機實現大規模的所謂「紅旗政策」與內奸政策，以破壞共產黨與救亡運動。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時，提出要抗戰期間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一。對共產黨宣言遲遲不肯發表。對福建紅軍游擊隊何鳴部借口集中改編，加以消滅。對陝甘寧邊區始終不實現承

認的諾言，並組織四入股政治土匪，自邊境進攻邊區。八路軍參議宣俠父同志在西安被暗殺。

(一) 抗戰開始時日寇與汪蔣的外交詞令比較：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變爆發時，敵近衛內閣高叫：「不擴主義」與「局部解決」的原則。七月十四日，汪逆兩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張。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蘆溝橋事件報告中亦謂：「……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我國國策爲求自存與共存，始終愛護和平。」

(二) 南京失守前，德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和議

日寇向蔣提出第一次和議條件。

十月，據英國標準晚報傳出外交上之可靠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贖和條件提交蔣介石，內容凡六條：一、內蒙獨立；二、華北自治；三、上海佔領地作爲日本租界；四、山海關到安南沿海的捕魚權；五、中國退出國聯；六、中國不得設空軍。

親日派一次醞釀投降

十一月十三日，「解放」二十三期時評：「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稱：「……日本帝國主義在利用一些老牌漢奸在上海到處活動，散布「和平」空氣，勾引政府內部的一些親日份子，曹汝霖、王克敏、陳覺生、李思浩、梁鴻志、吳光新這一批漢奸，現在均雲集上海滄州飯店、哈同花園，忙個不休。而政府內的某些親日派官吏，亦秘密往來於上海，與這些漢奸接洽談判。據可靠消息：李思浩在滬活動，曾與翁文灝有所接洽，吳鼎昌在滬曾與一日本外交員秘密談判，王曉籟曾與日紗業界某某接洽和解中日戰爭，王克敏、陳覺生及一日本外交員曾與中國財政界某要人接洽，南京政府內主持黨務某要人在滬與銀行界會晤，醞釀和平運動。李思浩最近曾有一封信至南京政府某要人略云：「上海事件如有任何困難之處，願竭力加以調解之。」他同時對中日談判提出下列意見：（一）實際承認滿洲國；（二）上海恢復八一三以前現狀；（三）維持山東韓復榘；（四）共同防共；（五）華北中日雙方均不駐兵；（六）「經濟提携。」這與日本的六個條件（見前）只有詞句上的差異，實際上是如出一轍。漢奸們正在奉其主子的命令，勾引中國的親日派，進行滅亡中國的勾當。」

陶德曼提出的議和條件：

十二月，南京危急，二日，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中日和議。據甘介波至國民參

政會電：德大使第一次調停之條件爲：（一）承認偽滿、內蒙獨立；（二）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之不駐兵區域；（三）擴大淞滬停戰協定，非武裝區以國際警察代替中國保安隊；（四）中日經濟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絕反日運動。德大使第二次調停之條件爲：（一）中國政府應拋棄聯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區域內設立非武裝區，並成立特殊政權；（三）日滿中締結密切經濟合作之協定；（四）中國對日本爲必要之貼賞。六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徐謨次長報告德大使調停和議。汪逆投敵後，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作「舉一個例」一文，將此次會議記錄發表。發表之後，吳稚暉爲文斥汪逆「洩露國家機密」。但對於事實內容，並未否認。茲將會議記錄及吳文摘錄發表於左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秘書長張羣，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起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到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

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傳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維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向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鑛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越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徐謨自稱——下同）仍於三十日倍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惜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德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

蔣介石一次動搖

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

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編——者）。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變爲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國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担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談，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爲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條須請德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停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

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為傳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以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為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為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與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復。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吳稚暉：「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摘要）

汪逆發表「舉一個例」，公佈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後不久，吳稚暉發表「對汪精衛『舉一個例』進一解」一文，其中稱：「汪氏斷斷於主和者，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批露，只就是洩露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以洩露秘密，處刑更嚴。汪氏此番自己亦知道「為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露了秘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已自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秘密，敵人尚不敢借此宣傳，即陶大使亦未便在外宣露一些，……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露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

『七七』至南京失守前後，國民黨的投降論調摘要：

南京失守以前，「汪精衛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先後發表了「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的文章，與「我們怎樣持久」的演說，提出了「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與「犧牲才能持久」的內政政策。」（解放一卷二十六期）他的「只有犧牲的民族失敗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南京廣播所謂「最後關頭」裏說得很清楚，他說：「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仰就只有做傀儡了。」又八月七日在南京「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中，他又說：「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他解釋所謂老實話道：「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至於所謂「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那就是德意日路線的外交方針，他說：「三中全會宣言裏有：『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的一句話，這句話指示了我們今日的外交方針」。照汪精衛的解釋：抗戰是和平路線，九國公約提議調解也是和平路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是和平路線，聯絡英美法是和平路線，而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而國民黨機關刊物「民意」一卷四期發表三七年底谷正綱所寫「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一文亦稱：「『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這也是毫無義疑的。中國單獨抗戰之際，與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之各國加意聯絡，期待其更進一步對於中國予以援助，對日予以制裁，同時對於和日本訂立

協定（按即反共協定）之德意也加意聯絡，期待其能維持中國向來之友誼，……這在中國實爲當然之事。……」又「民意」創刊號（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陶滌亞所寫：「戰始能和雖和必戰」一文，與汪逆機關報中華日報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論所持之「戰中求和亦必戰」簡直是同調的再版。陶滌亞說：「目前我們的抗戰雖然在猛烈的進行着，但是這種戰事也不是求遠不變的。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要和敵人拚命，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講和，只是必須客觀環境構成了和的條件，我們才能够停戰講和。……」

（四）南京失守後，敵寇誘降與「重演『三國還遠』」的故事，
以制止中日戰爭的建議。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六日，敵會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威逼與誘降並施。二十三日，敵外相廣田繼稱：「日本對華並無領土野心，也不要華北脫離中國，日本希望中國認清現勢，重新合作。」（註：南京亦於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三十八年一月十日駐日大使許世英始返國。）

日寇一打一粒

五月二十六日，宇垣一成任敵外相，取消了不承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宣言。

六月十八日，僑臨時政府與僑維持政府相繼成立後，發出勸蔣投降的通電。二十二日，文匯報社論提出「一個建議」，由英、美、法蘇等各國來舉行「和平」會議，以制止中日戰爭，「重演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以「重造遠東均勢」。茲將該建議理由要點原文摘錄如下：

第一、無論從財政上、軍事上去觀察，現階段的日本，已到了無力拒絕外國干涉中日戰爭的地步，……所以此時列強如能出來制止日本的侵略暴行，自必事半功倍，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是不難重演於今日的。第二、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的遠東均勢，是英美的合力來維持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破壞了遠東均勢，並變本加厲侵略中國，目無國際條約，實由於英美對遠東問題的步調未能趨於一致，現在如果重造遠東局勢，更非依靠英美的合作不可。畢特門說：「惟有英美的聯合艦隊向日本發言，才有權威，才能生效。」第三、英、美、法、蘇諸國如不於此時出來制止日本侵略中國暴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那末遠東戰爭不獨要延長下去，列強的在遠東利益，盡入日本的魔掌，一掃而去，而且遠東戰爭，必有一天擴大爲世界大戰，反爲人類空前的浩劫。最後，我們並不希望英、美、法、蘇成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因爲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同時也不希望英、美、法、蘇諸國出來作武裝調停；強迫日本終止侵略暴行，因爲這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而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求英、美、法、蘇諸國邀請全世界的愛好和平國家，召開世界和平大

會，商討終止遠東戰爭的具體的辦法，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與秩序。

(五) 廣州武漢失守前後，汪精衛通敵有據，

最高當局不予處分。

七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公開在中外各報發表談話，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和平調停。

日寇提出二次議和條件

八月，張高峯事變時，外傳日本向中國提出五條件，據五日香港通訊稱：「日蘇邊境糾紛日烈，有成爲大規模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空氣，今日（八月五日）又盛傳於香港。上午「宇林西報」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各晚報均刊載五條件是：（一）日本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兵；（二）承認滿洲國；（三）虹口、閘北、江灣，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賠償此次戰爭損失；（五）共同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這時候據聞軍事機關搜獲汪精衛通敵的証據。（按：汪逆此時期同時對海通社路透社記者發表了「和平之門未閉」的談話）二十五日，武漢失守。

十一月三日，緊接着武漢、廣州淪陷，敵政府再度發表聲明，宣稱：「國民政府如拋棄其目前的政策，更改其構造，出來參加『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時，不予以拒絕。」出旬南嶽

軍事會議中（按：該會議於二十五日開幕）有人提及搜獲汪精衛通敵證據事，但最高當局暗示就是汪果有此事，也要讓其完全証實後才可處分。

（六）武漢失守後的『遠東慕尼黑』危險與所謂『恢復七七』

以前狀態』的主和論者

日寇再拉

十二月三日，敵會近衛宣稱：「中日衝突可有解決之望，只需蔣介石將軍向國民政府辭職，而參加行將成立之中國新中央政府」云云。（編者按：十二月初，敵少壯軍人主張改變目標，停止反蔣，把目標縮小到「反共」，如蔣能「反共」，日本不僅不「反蔣」，且可「擁蔣」，歡迎蔣返南京。」）五日，胡適大使奉蔣命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謂：「中國自廣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間接之和議建議，但因日方所提條件在中國萬難接受，故決繼續抗戰」。十八日汪逆夫婦及隨從一人，暨陶希聖、傅斯年等投敵，離渝飛滇。二十一日汪逆夫婦，曾仲鳴、周佛海、陶希聖、傅斯年等抵河內。（註）

近衛聲明日本與「新中國」關係三原則

二十二日，近衛發表聲明，提出調整日本與「新中國」關係之基本原則：（1）「滿洲

「與中國完全外交關係之成立；(2)中日反共公約之締結；(3)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經濟合作。關於中日反共公約，日本要求在本約有效期間駐兵於各指定之地點；至於經濟合作，允許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有居住與營業之自由，尤其在華北與內蒙地域，其資源之利用與開發上，積極給日本以便利。二十四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電訊指出：武漢失陷後，日本亟盼和平，英國有勸中國議和可能，美國將支持英國之主張。(按：武漢失守前，自六月所謂「三國還遼」的建議起，一直到此時和以後，不僅敵寇誘降國內投降派求和，同時英美勸和，企圖實現「東方慕尼黑」的危機，仍有加無已。這時某些政界名人，公開響應英美反動派的建議：「重開一太平洋會議，邀請蘇聯和德國參加」。「成立調解委員會」，調解中日戰爭。)二十六日，蔣介石發表駁斥近衛聲明。二十九日，汪逆發表投敵監電，贊同近衛聲明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

陶百川主張的議和條件

三十一日國民黨機關刊物「血路」四十四期，陶百川公開發表恢復「七七」以前狀態，放棄東四省爲條件的「議和」主張稱：「我們以爲日本如確有誠意與中國罷戰言和，應立即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即：(一)日本應盡撤「七七」後佔領區域內的陸海空軍，而由中國軍隊回師駐防；(二)日本應盡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組織(讀者注意：作者此處南北大小傀儡組織並不包括「七七」前冀察政務委員會、冀東偽政權在內、滿洲偽政權更不必言

）而由中國政府自由行使其職權。」

國民黨降官題名錄

註：國民黨中央委員軍政要人隨汪逆先後投敵者，根據不完全統計，共有：副總裁行政院長汪精衛（偽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中政會委員）中央委員宣傳部部長周佛海（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政會委員兼秘書長），監委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偽外交部長、中政委員），中委陳公博（偽立法院長、上海市長、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中委內政部長陳羣（偽內政部長、中政委員）、監委陳肇君（偽中政委員）、候補中委繆斌（偽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候補監委溥侗（偽國府委員、候補中委何世楨（偽中執委）、候補中委、政院秘書長曾仲鳴（已死）、龐炳勳、吳開先、陶希聖（詳後）

、候補監委陳中孚（偽中監委、監委恩克巴圖（偽中監委）、候補中委陳中孚（偽中委）

、監委顧惘琛（偽中政委、監察院副院長）、監委、監察院副院長許崇智（不明）、候補中委李福林（不明）、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憲思平（偽中政委員、實業部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湯良禮（偽中央監委、宣傳部政務次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李聖五（偽中委、教育部長）

、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陳君憲（偽中政委員、建設部長）、國府秘書、軍委調統局第三處長丁默村（偽中政委員、社會福利部長）、國府立法委員林柏生（偽中政委、宣傳部長）、陝西教育廳長周學昌（南京市市長）、鐵道部政務司長陳耀祖（偽廣東省長、四屆中政委）、

鐵道部參事趙尊嶽（僞中政委、鐵道部次長）、天津市教育局長焦瑩（僞中政委、考選委會委員長）、綏遠財政廳長蘇體仁（前僞山西省長）、曾連任陝、甘省主席劉郁芬（僞總參謀長、已死）、橋委會常委陳春圃（僞中政委、中組部部长、武漢警備司令葉蓬（僞陸軍部部长）、軍委會委員鮑文越（僞中政委、參謀總長）、國府參事、交通部航政司長蔡培（僞駐日大使）、上海特別市黨部書記長蔡洪田（僞中委）、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僞中監委）駐美大使顏惠慶（不詳、庸報已公佈投敵）、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投敵後駐港、現不館）、第二集團軍總指揮鄭大章（僞陸軍部次長、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陸軍中將駐日大使詳武官蕭叔萱（僞軍事參議院院長、軍委會委員）、調統室科長李士羣（僞中政委、江蘇省長、軍委調統部部长）。

二 從汪逆投敵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這一時期，國民黨抗戰高漲已經過去，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從抗日陣營內分裂出去，投降了日寇。汪逆高呼反共，公開號召重慶國民黨投敵賣國，而重慶國民黨當局表面打着抗戰旗幟，高呼「反汪」「反降投」，而暗地則亦照樣進行反共及準備投降。汪逆公開實行近衛三原則。蔣介石則表面駁斥了近衛聲明之後，事實上却逐步實行了近衛三原則。蔣介石一面高喊：「反攻」「勝利年」作幌子，一面却暗中頒佈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對於處理異黨問題實施辦法」、「淪陷區防範共

黨活動辦法草案」等等，並由政治限共走到軍事磨擦，對共產黨打、罵、捉、殺、鑽五刑俱全。在大後方則捕殺綁架共產黨員及進步青年之事，持有所聞。平江慘案、確山慘案與成都特務機關製造的所謂搶米事件，尤其暴露反動派的猙獰面目。在前線則國民黨部隊抗戰日益消極，反共日益積極，而抗日最堅決的八路軍新四軍後面「收復失地」，張蔭梧、石友三之在河北，秦啓榮、沈鴻烈之在山東，朱懷冰之在山西，凡與敵人聯絡協同動作，陝甘寧邊區亦發生淳化、枸邑事變與隴東事變，周圍大軍雲集，層層封鎖。一九四一年初，國民黨配合敵偽襲擊我奉命開往江北的新四軍，發生皖南事變。自皖南事變以後，國民黨從此繼續不斷的在蘇北、在安徽、在皖南、湖北、皖北、山東等地區，進攻新四軍。對新華日報則橫加壓迫、毆打報丁，撕毀報紙，社論一天一連幾篇送予審查，均不准刊登。對大後方的共產黨組織，則大批逮捕、暗殺。並廣泛推行所謂「自首運動」，以實現其「消滅」各地共產黨的方針。國民政府政治上日益倒退，這一時期重慶與敵偽的勾搭關係一唱一和。都是以反共為中心。顯然可以看出敵偽不斷以反共為日軍停止進攻及變「反蔣」為「擁蔣」的條件，而蔣介石寔際却在遵照辦反共事宜。

一 汪逆投敵後，重慶國民黨禁止擴大反汪與遠東

慕尼黑危机的發展。

一九三九年

十八

一月四日，敵近衛內閣辭職。五日，平沼內閣成立。十四日國民黨刊物「血路」四十五期陶百川公開發表禁止擴大反汪運動的怪論稱：「某些人且乘機擴大反汪運動，來打擊中國國民黨的一部份最忠實最勇敢的同志，……某些人的陰謀，已經中央發覺和禁止了」。

日寇三粒

十七日，平沼發表演說稱：「……國民政府方面若有以眼人士，要與帝國合作，而成爲更生新中國之基石，則將歡迎之，共同從事「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出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中全會說明抗戰到底爲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狀態。

蔣介石二次動搖

二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稱：中國官員昨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稱：「……中日問題將由列強以壓力直諫中日兩國解決之，並建議「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中國尊重日本在華之條約權利」，並說：「討共問題，將成爲一爭點，此一錯綜事件，至今未獲妥善之解決方法」。〔註：十一日，上海導報社論，對「中國官員談話」評稱：「今天中國之所以繼續抗戰，而不能造成遠東慕尼黑前途，完全是爲了「討共問題」無法解決，如其沒有共產黨，中

國早可接受日本的條件，而「媾和」了。」十六日導報社論續稱：「本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所述『中國官員』的談話，我們會於十一日社論中指出，說這類話的人是『汪精衛的替身』，『汪精衛的鬼魂附在那幾位所謂『官員』的身上作祟』，果然，日本及漢奸拿着這段消息與高采烈的說：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講和了。汪精衛的嘍囉更欣然相告說：『汪先生的建議，事實已為政府所接受，不過汪先生認為不妨直接談判，而在重慶的官員則主張在國際會議中談判而已』」。

十日，敵軍侵入海南島，以答覆英法強硬的照會，（編者按：一九〇七年三月，法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換公文，聲明中國不以海南島任何部份割讓第三國，同年法日政府在巴黎簽訂條約，雙方互允，尊重中國中國獨立與完整，……此次日寇悍然不顧英法的諒解，而侵入海南島，據十三、十四兩日導報社論認為：『日本政府識透了張伯倫、達拉第的忍辱屈辱的本質，雖然英法都對日提出了強硬的照會，但用強硬的行動來答覆他們一定會軟下去的，在歐洲對西班牙問題如此，在遠東對中國問題也可以在侵略者的暴力壓迫下犧牲中國。』

「日閥雖口頭聲明絕不參加解決中日問題的國際會議，然關於這種會議的接洽，確實在暗地進行，日本之迄今未答覆美英法的照會，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日軍在此時之進攻海南島，自更含有在將來可能的國際會議造成既成事實的作用。……路透社九日重慶電所傳『中國官員』告知該社記者『遠東國際會議』「幹旋」中日戰爭之說，從這消息裏可以看出兩個意義：第一、中國的「官員」中隱藏有汪精衛的替身；第二、國際的幕尼黑投降主義者確

實還在積極設法在遠東再造一個慕尼黑協定。」二十日，高宗武囑汪命至東京與平沼接洽「汪平沼準定」內容。

二 汪平沼協定以後，重慶報紙批評當局姑息養奸。

四月一日，汪逆所寫「舉一個例」在南華日報發表，公佈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記錄中徐次長關於德大使見解調停和議的報告，（見前）並謂：「中央心裏想和而口裏不敢言和，彼則心口如一，乃為國家民族着想。」

汪平沼協定內容：

五日大公報及路透社重慶電訊，揭露汪平沼協定內容，大意是勸日寇速在中央新軍未就緒前，猛力進攻，至遲須於五六月間攻佔西安，以截斷主蘇交通；攻佔南寧，以截斷安南廣西交通；攻佔南昌，長沙，截斷贛湘路；進佔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咽喉。他認為為顛覆國民政府計，由襄陽出漢中之線，及由南昌，常德經貴陽入川之線，敵須置重兵，以塞行中央突破。

汪逆對蔣一打

他說在敵軍達成上項任務後，自任策動倒蔣反共戰爭，右發動二十師以上兵力之把握。為達到上述兩項任務，日本應每月給汪活動費三百萬元。高宗武携此條件至東京與平沼屢次

接洽，敵已先後兩次付款各二百萬元，並議定汪出任傀儡之先決條件九項。大公報同日社評並謂：「汪逆豎電，黨中央只予徐籍撤職的處分，並未發動國法。（按：汪逆於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走，二十九日發出豎電，三九年元旦只予以除籍撤職處分以後，遲至同年六月八日，因國內民衆團體海外僑胞紛紛懇汪，國府電明令通緝。（對於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遙法外，繼續進行其大陰謀，實爲「姑息養奸」，過於優容。」）

卡爾勸和

此外，四月間英大使卡爾曾由滬到渝，當時輿論均謂與勸中國當局與日寇議和有關。

三 反共磨擦聲中，國民黨反動派的「曲線救國」論

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反共磨擦當中，經常與敵人取得聯系，實行所謂「走曲線」辦法。而在此時期應以張蔭梧作代表，張蔭梧親自主持的聯敵反共的磨擦事件，較大者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博野事件，其時冀中激戰方劇，張密電所部，對博野軍區司令呂正操部進襲，後又在安國廟各莊活埋共產黨員宋振恒，何焜山，張振安，何福林等。此後不久，於三九年四月又越過 沱河，向冀中的八路軍進攻。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並演灤縣慘案。此外，張蔭梧在三九年四月還秘密制定了所謂「對僞抗日軍（指八路軍）之策畧方案」，配合日寇共同來夾擊八路軍。同時在這前後不久，他公開提出了「曲線救國」論。這種所謂「曲線救國

「辦法，不僅在他的部下流行着，如他所部韓祝光給某部信裏寫道：「刻本旅以受環境逼迫，本人於今日率領一部暫住大賚鄉，已與駐圍中取得聯絡，祈貴部於可能範圍內與敵部密切聯系，並祈與石頭莊身協軍李副旅長，劉團長亦取得相當連絡。刻吳團長已電致該部，勿令發生誤會。……」同時他還以「曲線救國」為汪精衛及其他漢奸辯護（張蔭梧曾汪精衛辯護道：汪精衛不是漢奸，而是「曲線救國」。張蔭梧同樣也用「曲線救國」論替華北著名的漢奸柴恩波辯護了一番，例如張蔭梧在他呈蔣委員長的一通電文裏，曾經這樣說：「柴恩波……為保存實力及施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實際仍為本黨作抗建工作，候時機成熟，定率部反正，與日寇以重大打擊也。……」張蔭梧在他呈軍政部何應欽的一通電文上，同樣為柴恩波辯護道，「柴恩波……為施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東區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而實……」而實是投降，是向日本帝國主義施行曲線「救國」！」（編者按：今天國民黨的降將如毛，降官如糊，連張蔭梧「曲線救國」論的歪曲的辯護也不用着了。）

四 英日談判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與「遠東慕尼黑」

的再醞釀

六月十四日起，天津敵寇行封鎖津英法租界。

七月二十四日，英日談判初步協議成立，訂有田克萊琪協定，主要內容是：英政府完全承認目前中國之實際局勢，而「英國知悉在華日軍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戰領區內公安之目的計，應有特殊之需要」。同日新中華報社論稱：「在英日談判之前，日寇要求：（1）英國放棄其『親蔣反日』政策；（2）英國在政治及經濟方面與日本合作，同時在維持天津租界之治安方面，亦與日本合作。……由此可見，解決天津事件，不過是談判的一面。而其另一方面，則是迫使英國直接對日本侵略投降，迫使他不得不早起來以『調停者』的資格去加緊作『遠東慕尼黑』會議的醞釀」。

汪逆對蔣一拉

八月九日，汪逆在廣州發表勸降廣播，略謂：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二十八日，平沼內閣辭職。三十日，阿部內閣成立。三十一日，汪託國民黨發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再鄭重宣佈：「以反共為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望海內外同胞共喻此旨」。

五 歐戰爆發後的投降危險與陶希聖偽裝

「反汪」的陰謀

九月一日，第二次歐戰爆發。五日，汪逆在中華日報以「歐戰與中國之前途」標題著文稱：「……自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我自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因為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

汪逆二拉

十九日，汪逆發出致重慶通電稱：「……最近共產黨主義流毒，尤速而且烈，中日兩國當此為世界危殆震撼之時，宜深相結合，不以東亞納此旋渦之中。……且中日兩國若於此時結束戰爭，開始和平，日本固可以居舉足輕重之地位，……中國尤可因此休養生息。……」

投降再醞釀

二十八日，外長王寵惠對美國合衆社遠東部總經理毛勒士發表談話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毛問：倘第三國出來調解，中國有何意見？王答：只要合乎我所說的光榮和平的條件，中國無不樂於接受，尤其希望和平的國家如美國能促成調停，王並請毛務將此意告訴美國。同日上海日軍發言人稱：中國在外交的運用上，向有三個方針：一、引誘第三國與日本交戰；二、希望第三國幫助中國抗戰；三、引誘第三國調解，促成和平。自歐戰爆發，第一、二方針無法運用，只有第三個方針，故有王寵惠的談話。接着張羣、魏道明等

紛紛赴香港，作和平的試探。

十月一日，香港大公報對王寵惠談話加以說明稱：王外長談話謂：美國於此時機對日說話最爲適宜。十六日孔祥熙答美聯社記者稱：「問題之中心不在中日能否媾和，而在日本能否放棄對華之侵略政策。」

汪逆派密使陶希聖回渝。

十二月褚逆民誼發表談話：「……吾人既往合作之精神，仍希忠實同志安然過來，相與聚首，精誠團結，共商國事，使本黨分而復合也。……」三十日，汪逆與敵寇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三十一日。陶希聖僞裝反汪，離京赴港，宣稱脫離汪逆僞組織。

六 米內內閣成立後，敵汪勸蔣合流，蔣介石聲明

拒絕汪對日直接談判。

一九四〇年

汪逆三拉

一月十四日，阿部內閣辭職。十六日，敵米內內閣成立。汪逆電蔣勸和稱：「……惟先生行能以國命民生爲重，及今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言和，根據近衛聲明的原則，以求

其具體的實現，則兆銘及諸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二十一日，陶希聖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二十二日，滬滬各報揭露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其主要內容包括三個問題：第一，根據什麼原則調整；第二，對事變以來既成事實如何處理；第三，對於事變繼續當中所引起的特殊事態，又怎麼解決。對第二第三兩問題「調整綱要」裏所規定的辦法有四點，關於第一問題調整的原則是：一，善隣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携；四，設立「強度結合地帶」及「特殊地位」。此外是與「臨時政府」關係的調整。再其次是與「維新政府」關係的調整，（以上各項詳細條款及說明從略）

日寇四拉

二月二日，米內在議會答辭處理學變方針謂：「至新政府（指即將成立之偽寧）與重慶政府間之關係，則暫時處於對立地位，蓋不得已。然吾人則儘量期待重慶政府能解體而參加新政府也」。十七日，敵興亞院總務柳川在議會答辭處理學變方針謂：「……曩日雖已聲明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然不以其為對手之程度究應如何，……重慶政權若能與中央政府採取同樣方針，則自然兩都將會合流也。」十八日蔣介石重申長期抗戰決心，拒絕對日直接談判。二十五日，中國政府發言人否認國民政府濫借王克敏或汪精衛之援助，與日本試作和議之傳說。

汪逆四拉

三月十二日，汪逆發表和平宣言，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

日寇五拉

十三日，米內響應汪逆和平宣言略謂：「日政府與中國新中央政府共同建設新秩序，其具體方案即以近衛聲明爲準則，中日兩國今雖以干戈相見，猶應有惻隱與寬容存乎其間。」十六日，周逆佛海向記者談全和面和平稱：「……假使日本與重慶互願講和，我們準備以全力以促成之。如重慶不願我們參加，我們也會站在一邊，絕對不加以妨礙。……所以新中央政府成立後，我們對於重慶不僅沒有絲毫敵對心理，而是懷着無限的期待。」二十三日，汪逆廣播「望渝方破除成見加入和平運動。」同日，僞武漢綏靖主任葉逆蓬向記者談話謂：「余相信今後之工作，至少須將國民黨五分之二拋至和平建國方面……結局余等之敵人即共產黨及其軍隊。」三十日，僞寧政府成立，發表還都宣言招降。（按：僞寧政府成立以後，汪係代覲主席，主席一職始終虛懸，這正如上面周逆佛海所說，他們是懷着無限的期待

汪逆五拉

四月十七日，汪逆在武漢廣播勸降。

七 偽寧政府成立後，德意勸和，敵會企圖直接對蔣談判，

盡撤南甯，龍州、欽縣的軍隊以誘降。

六月十九日，林逆柏生對重慶廣播稱：「我如今鄭重的說，蔣介石肯為國家打算，停止戰爭，實現和平，我們不但可走開，並且可以死，願以死來換取國家的生存獨立。蔣介石沒有這覺悟和決心，那是我們不得不請他不要再阻止我們不挺身起來打破一切障礙，參加和平，請你們伸張和平的巨掌，和我們攜手！」

七月十六日，米內內閣辭職。十八日，英日簽定封鎖滇緬路，協定會規定日本應於十月十八日以前三個月內，設法與中國成立全面和平。二十二日，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加強德日外交。

日寇六拉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敵報「每日新聞」發表：德意法駐重慶大使建議中國政府與日本締結和平，同時中國駐美大使接到美政府之通知謂：鑒於中國政府之和平計劃將取消貸款予重

慶之原議。二十六日，合衆社暴滅敵寇誘降陰謀稱：「權威人士今日透露松岡要求暫時停止日本與南京政權首領汪精衛之談判，蓋松岡將作最後一次企圖直接與蔣介石談判。」同日上海合衆電「德國現正德意日本政府向××方面建議，除華北外，願將其他日軍佔領區及華南若干個軍事根據地交回中國，」所謂「……：放棄汪精衛政權，而以較寬大之和平條件餌蔣介石，如可能者，則要英國任調人。否則由德國任調人亦可。」

日寇一次撤退

二十八日，敵軍自南寧龍州撤退誘降，同時並有敵人將自宜昌、九江，甚至自漢口、廣州撤退的傳說。

十一月一日，同盟社電稱：「久居香港之顧孟余，於最近向蔣介石進言，勸其以汪蔣合作之方式，收拾時局。」七月，陳逆公博談全面和平。

日寇二撤

十三日，敵軍又自動退出欽縣。十八日，海通社發表和平談判內幕稱：「在過去數月中，日本已向重慶政府提出若干和平建議。同時最近中國駐東京大使曾爲此目的在香港與日本代表取得接觸，中國大使曾親自將極寬厚條件帶至重慶。」

日寇七拉

二十三日，合衆社揭露日寇要求談判和平稱：「上海方面盛傳，日本又向重慶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議，舉行和平談判。該消息謂：日本要求在十二月一日以前接受其建議，不然則將正式承認日本卵翼下之南京汪精衛政府」。二十六日，合衆社又暴露德國勸降：「據稱德國駐重慶外交官（按即德代辦斯達瑪）正以壓力加諸中國領袖蔣介石，企圖使中國與日本成立和平。」

汪逆六拉

二十七日，汪逆電蔣勸降謂：「余深望足下堅決的宣佈『中日鐵和』之主張，使全國人民努力協助政府，寔現『和平』，及恢復治安之工作」。

日寇對蔣二打

三十日，敵政府公佈承認偽甯政府及「日汪條約」。

日寇八拉

十二月九日，敵外相松岡答記者談：「全面和平」和「將來中日必能實現『全面和平』

南京政府尚未關閉與重慶和平之門戶，本問題將由南京政府任意決定之。

八 皖南事變中國民黨配合敵軍圍攻新四軍與事變後

敵寇的誘降演說

一九四一年

日蔣一次合作反共

一月四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向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突然襲擊。十七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正式發出通令，喪心病狂誣陷新四軍爲「叛軍」。

同日，同盟社從南京發出電訊略謂：「重慶政府嚴令長江下游江南地區之共產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爲使共產軍早日移往江北，遂開始在東流附近圍攻新四軍及共產軍各軍隊，共產軍一部已於十日由蕪港附近潰退江北。自十四日以來，日軍各部亦攻擊宣城、令墳附近之新四軍，『國民政府』綏靖部隊亦協助日軍作戰。」十八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發表演說。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會發表命令與談話。

日寇三打九拉

二十一日，敵七十六屆議會，敵會近衛發表演說稱：「然而中國尙未覺悟，民族共和之大道尙存存着一種勢力，它以抗戰作爲救國之事業，……帝國堅決消滅從事抗戰者，凡與我共鳴者，則欣然與其提携」。同時松岡稱：「日前實已企圖促使蔣政權內部之分裂，則日見據烈。……」二十六日，敵會松岡在議會談「汪蔣合流」稱：「要求蔣介石之反省，即要求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但此種工作未能成功。現在既已正式承認「南京政府」，即當努力援助之，使其成爲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但今後仍勸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東條（當時爲陸相）稱：「欲使重慶政府反省，必須加以重大之壓力，如再加以壓力，或可轉變蔣介石之想法」。三十日，松岡在衆院答辯談「汪蔣合流」稱：「日前現內閣促使蔣介石反省之主要目的，在使蔣介石與以汪精衛爲首之「南京政府」合流。俾在此基礎上，更進而與日本進行「全面和平」之談判。……常日本政府尙未正式承認汪政權之時，汪精衛曾邀重慶政府派人與彼合流，進而與日本談判全面的「和平」問題，當時汪精衛並有此種精神，即爲顧全中日大局計，設彼有阻碍中日和平談判處，彼願出遊國外，以促成此中日間之絕大好事。又我政府亦曾有此明白之表示，即雖在我政府正式承認「汪政府」爲「中央政府」後，而我政府實並未放棄促使蔣介石反省，而與「汪政府」合流之希望」。

汪逆願意『出洋讓賢』

又汪逆在此之前亦宣稱：「爲中國前途及全面和平之實現，如蔣先生肯來南京，我願立

即出洋讓賢」。

第一批將領投敵

二月十八日，國民黨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總隊副指揮李長江率部投敵，該部高級官員隨李逆投敵者計有：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縱隊第一支隊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隊司令顏秀五、第六支隊司令陳才福，第七支隊司令秦慶霖、第十支隊司令范傑。

第二批將領投敵

二月，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楊仲華率其部投敵。

日寇十拉

四月十一日，近衛答記者囑：「爲積極育成汪政權，今後並不一定要絕對的排擊蔣政權，余倒想向使蔣×合流之途，實現全面的和平方向邁進」。

九 美國解禁銻、橡皮輪日後「遠東慕尼黑」的新危險

五月五日，美取消銻、橡皮輪日及中國淪陷區的許可制度的命令。十日，荷印英美石油公司重訂對日石油協定。

美國調停中日戰爭

十八日，新華社莫斯科電訊，揭露日美擬訂立協定，調停中日戰爭謂：「真理報載東京消息稱：『美國最近由日本非官方之負責人士接到一締結日美協定之提議，提議中提出美國干涉中日戰爭，日軍則先由中國內地撤退，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支配地位，日本保證不向南洋發動戰爭，予日本以重要經濟讓步，尤其在南洋方面同時或者由美國貸款予日。』據訪問稱：在談判此問題之前，華盛頓要求日本取消一九三八年一月不以蔣介石作爲談判對手之聲明，及修改歷次所作關於不容許三國干涉中日戰事之宣言，闡明日本在遠東之經濟計劃。」（按：真理報揭露上述日美妥協真相後，日美雙方均不否認。）十九日，松岡、格魯在東京會議。二十三日，重慶軍委會發言人稱：「上週寇軍全面發動，總計達三十萬人之多，其結果不過如此，以此種方式來修談解決『中國事變』，不但世無相信之人，即敵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這無異乎說軍事進攻方式是不能解決的；果然，同盟社接續就紛紛報告：日各戰線軍事當局均稱第一期作戰已結束。互爲唱和。）二十八日，羅斯福在特別新聞會議上說明：「目前美政府無意禁止石油運往日本，或更加限制石油之對日輸出。」

十 德蘇戰爭爆發後，汪逆勸降與何應欽勾搭德代辦

汪逆七拉

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二十四日，汪逆在南京廣播：「我國民政府同人，不斷反省檢討自己之責任，努力增強自己的力量。同時對重慶方面亦未嘗忘却促使其早日參加和平之工作，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均通過各種方面促使他們參加，對於促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已作不少之努力，今後仍將繼續努力。」（見東京日日新聞）

七月二十日，汪逆向日本外務省記者團宣稱：「仍希望重慶政府轉向」。

『何應欽勾結納粹』

十四日，新華社重慶電稱：「政府與德意絕交後，……親日親德派大為不快，……竟大擺筵宴，歡宴德代辦及海通社駐渝社長等多人，聞出面請客者有何應欽及親德派頭子某某等……席間賓主各作何語，無人知道，惟據接近何應欽及親德派某氏稱，何等認為德必勝，日亦必勝，英美蘇中四國必敗，對德絕交實屬錯誤。為討好希特勒起見，設此次歡宴以為將來復交親德地步。親德派方面人員更放出空氣，謂德國方面條件為：德軍打至中央亞細亞時，擔負修築一條鐵路，通至甘肅，扶助中國實行法西斯制度，以何應欽為中國之具當，以某公為中國之拜爾朗。中國方面條件則為：與英美絕交，廢止滇緬路修路協定，以人力物力供給德日兩國，惟全盤計劃有待於德勝蘇敗與日本攻蘇，故目前須積極發動反共反蘇。……」

十一 希特勒承認汪逆偽組織後，重慶市面，竟有公開

宣揚希特勒主義，並鼓吹日本實無法可以戰勝者！

九月二十日，羣衆六卷十期漢夫著「抗議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稱……希特勒開始反蘇戰爭，並承認汪逆後，市面上竟有以「大地政治，或「地緣政治」爲標榜，爲號召，而公然大肆宣傳者。……」「這個被譽爲「一種經國大記之學」，……被稱爲世界政治之南針的」「大地政治」究竟是甚麼呢？我們則引那般鼓吹者的自由吧：

「此次歐戰大局發生絕大變動，德國左右攻擊，着着勝利，納粹卍字旗幾有到處招展之勢，希特勒正在欲決勝千里之外，（缺六字）大地政治學者，參預日爾曼民族，對此利學津津樂道，而國民學校早已採爲必修之課本，柏林多年以前已有一種刊物，專載此類文字，風行各地」。（荆凡創刊詞）……我們的有名的「大地政治學者」×××先生×××先生，不是都會不斷的發表德強蘇弱，法西斯德國必勝的「大地政治學」的謬論嗎？東北大學教授×××先生在關於德蘇戰爭，答客問（荆凡創刊號）裏，不是也在那裏稱讚德國決然（！）攻蘇，認爲：「德國攻蘇可費力少而獲利多」嗎？不是在以德國的宣傳爲宣傳的說：「蘇聯內部不安其國軍素質低劣」嗎？不是在以戈培爾的口氣說：「只須將蘇聯第一線軍隊六十個師殲滅，便一切迎刃而解」嗎？不止此也，「大地政治學者」們既以參預希特勒的幕僚

爲榮，自然也以做希特勒的盟友的朋友爲榮，請看「大地政治學者」的刊物上不加絲毫批評的把德國地緣政治雜誌上關於遠東的中國抗戰的文章譯發了出來，……它大捧其日寇的糧隊說：這「殆爲世界上最精者」，說日寇「除內部崩潰外，其本國實無法攻擊之」。這還不算，這篇文章對中國抗戰的勝利完全漠視，認爲並不重要，比如說：「吾人今不必以幼稚之「誰勝」「誰負」爲問，」……須知勝負問題絕不重要」。這已經是從對希特勒的幕僚的讚揚者的地位，到遠東讚揚日寇軍力對中國勝利不加重視了。……」

十二 陶希聖潛回重慶後，發表所謂『汪精衛的反蘇反共』的謬論。

蔣介石容納密使陶希聖

陶希聖僞裝反汪，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離滬赴港，公開宣稱脫離汪逆僞組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見前），並接着於同年二月十三日在大美晚報和同時期港滬其他各報發表「『新中央政權』是什麼」，二月十九日著文分析「（新政權）延期的原因」，三月十日發表「長江下遊的日本經濟獨佔組織」（兩文見於大美晚報三月十日及十一日），三月二十五日發表「日汪所謂『中央政治會談』」（大美晚報），作爲返回抗日陣營的政治資本，後不數月，即潛回重慶，從事策動投降的陰謀

活動。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竟在中央週刊發表「汪精衛的「反蘇反共」」一文，爲汪逆作辯護，以詭譎蘇聯與中共的漢奸論調的宣傳，該文曾謂：「所以反蘇反共，是一成不變的，……德蘇協定成立，日本調整日蘇關係發展，叫汪不要標榜反共，……華北日軍企圖逼馮莫斯科以獲得日軍與中共互不侵畧諒解，……因此，汪偽反蘇反共主張不能得到華北日軍同意」。

十二月八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

三 從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敵酋谷荻的四次誘降

這一時期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已堅決對日作戰，「遠東慕尼黑」的危機已告結束；但因英美在遠東的暫時失利，尤其是滇緬路的被切斷，使重慶方面與日直接勾搭默契的傾向，或爲發展。由於英美蘇進一步的團結，共同擊敗法西斯侵略者的形勢已成，這與國民黨反動派挑撥日蘇戰爭及求英美先反攻日本，蔣介石坐享漁利，以國際援助進行反共內戰，最後實現法西斯專制主義的方針不合，於是整個戰略上反對英美蘇同盟國的戰略計劃，並鼓勵日本爲希特勒開闢一個夾擊蘇聯的第二條戰線。在抗日問題上則走到「看戰」「觀戰」，以集中兵力於反共，反人民，反異己。但同時爲了奪取政治資本（如領袖的榮譽與地位）和驅取盟國的軍火與麻痺國內的視聽，却又掛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戴着抗戰與民主的幌子，以對聯合國進行投機。至於內政，在政治上，以言民主，則排斥異己，抗日黨派無法存在

，無論團體與個人，開會說話寫文章以至居住走路，均無自由。包辦指定（對會議）與輪番審查（對文章）之不足，更重重監視（從集會言論到居住走路。）此種情形，尤以重慶為甚。以言經濟，則官僚資本寔行壟斷投機，不僅工農業破壞達於前所未聞之程度，即中小商業亦叫苦連天，無法生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達成進一步的壟斷投機，在膨脹通貨、抬高物價、剝奪民食、剝削勞動之下，更實行種種具體辦法，如專賣，限價……等，以求超之尋常之厚利。以言文化教育，則篡改歷史，廣泛宣傳法西斯文化，排斥一切進步思想，而代以一切敗壞民族氣節及封建復古的奴才教育。以言吏治，則貪污腐化，強徵捐稅，毀法亂紀，假公濟私。至於捆綁壯丁，強拉民夫，陷害青年，斲喪人格，尤爲舉不勝舉。其結果民怨沸騰，民變蠱起，各地災民以小孩充飢，死屍枕藉（其中以廣東，河南爲最），更屬慘不忍聞。馴至目前，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絲毫無改悔之意，內戰危機與投降妥協危機反而更趨表面化，以致在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進一步對重慶進行誘降之下，不願共產黨及全國人民與蘇英美人士的嚴正批評，一定要實行法西斯獨裁與貫徹反共的方針，於是高級將領大批投敵了，命令走「曲線」進行投降反共的文件到處發現了，連年企圖大規模閃擊邊區的空前內戰危機也發生了，作爲中國法西斯理論基礎的蔣介石與陶希聖合著的「中國之運命」也出版了，敵寇頻頻誘降也默不作聲了。這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企圖對敵寇進行單獨媾和

一九四二年

國民黨公開宣稱要單獨媾和

一月，國民黨中央某要人受蔣介石命，對美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對日作戰犧牲重大，如再不援助，中國便單獨媾和。（編者按：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最初蔣估計過高，以為美國很快就可以把日本壓服下去，於是中國便可以組織大元帥府，進行投機，自己也就居在大元帥府裏，自吹自擂，故對日德意宣戰；及至香港失敗消息傳出後，心灰意懶，如是大元帥府也不組織了，對日德意宣戰的郭泰祺亦差去外長職務，甚至對二十六個聯合國的簽字都發生了動搖，免強簽字後，覺得一無所得，便令某要人對美記者發表上述談話）

日寇四打一拉

二十九日，東條在議會宣稱：「今後帝國對重慶之方策，如其仍然繼續抗戰，則澈底粉碎之。同時熱烈期時其反省，促其完全拋棄對英美之依存性」。

三月前後，桂林市突然出現一個日本浪人叫黑田的，去見廣西的王席黃旭初，黃便打電話到重慶向蔣請示，蔣回電叫暫時看管，秘密談判。

第三批將領投敵

四月二十三日，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投敵前任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在魯南率第六十九軍暫編三旅特務旅全部投敵。隨孫逆投敵高級將領計有新編六師師長王濟瀚、暫編第三十師師長趙雲祥、一八一師師長陳光然、新編第十三旅旅長黃貞澐、第三十九集團軍特務旅旅長郭俊峯、冀察戰區游擊第一縱隊司令丁樹本、第二縱隊司令夏繼禮，警備處長孫玉田。

蔣命令部屬：敵來勿打，實行避戰

五月中旬，敵人沿浙贛路之金華、衢州進攻，蔣介石命令該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避戰，戰鬥結果，金華淪陷前關隘便先失守了，致使敵人跟着沿浙贛線大舉侵入，以至進抵贛東之撫州、南城一帶。關於浙贛線奉命避免戰鬥情形，從下面國民黨報紙的公開報導中亦可看出：

「當七月九日（敵人已進入贛東兩個月了——編者）我由贛東前線模峯縣到建陽，在第一招待所遇到倫敦每日快報特派員貝却迫和桂林大公報女記者楊剛，他問我前線情形，我說的是老生常談，軍事頗樂觀，政治有待努力。……後來遇到『輝煌軍』的幕僚長孟珠川及步兵上校孫鼎宸、龍放之諸君，談到浙贛的戰局，他們的意見是：數學上有一個已知數，一個未知數，而目前的戰局（指七月中旬）正是一個未知數，尚在勝負未明的分野，勝歟？轉進數百里，尙未反攻。敗歟？一切按照戰略執行，不獨戰力未損，而且達到了遲滯消耗敵軍的目的。

的」。

「……敵閥爲了先發制人，首先以大量空軍出動，轟炸浙贛沿線，集結六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其實只有兩個半師團）在烟俊六指揮下，先後由杭州南昌兩處發動攻勢，而以浙境爲主戰場，贛境爲支戰場。我們的戰略是避免與敵作正面的決戰。……當時似有「開放金關保衛衢州」之論，後來因條件不夠，受了種種限制，……因此我們遂決定開放浙贛線。……」（江西民國日報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浙贛戰局的透視」）

十一日，敵陸軍省發言人稱：「雖然蔣介石似乎期望仍繼續戰鬥下去，然而在他的贊助者中發生了分歧，其中某些贊助者認爲最好能根據近衛聲明的全文，與日本獲得諒解」。

注逆二打八拉

七月六日，汪逆爲「七七」五週年發表談話：「在重慶方面除少數冥頑份子外，大多數皆畏仰和平，我們和他們衷心合作，解除其壓制束縛之苦痛，使他們參加渴望的和平陣營」。同日，敵東鄉外相談話強調滇緬路切斷後重慶之困難，並言日本將「用各種手段使其屈服」。

敵寇五打十二拉

九月二十六日，東條在中央協力會議上談對華方針謂：「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中國沿岸完全被我制壓，滇緬路亦被我完全切斷，以及我屢次進行的作戰與不斷的討伐」，是使重

慶政權之力日益低下，現在它還依靠英美之援助能繼續抗戰，吾人當積極採取政戰兩方面之手段。

二 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與國民黨

高級將領大批投敵

一九四三年

日寇「對華新政策」

一月九日，敵汪精衛「歸還祖界及撤廢治外法權協定」，「對華新政策」開始，在逆參戰發表對華基本國策綱要：（一）日本期待兩國關係以中日提携基本精神，實現近期之發展。（二）深望中國獨立自主及國民政府政治加以發揮為基礎，使新中國能迅速建設。（三）決交還日本在華之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四）日本予中國以其他各種好意之援助，且參照今後新中日關係之發展，對舊有諸條約，亦加以考慮。

第四批將領投敵

十八日，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及副師長于懷安率全部投敵。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鄭霖霖同時亦隨吳化文投敵。

第五、第六、第七批將領投敵

二月十二日，山東游擊第二縱隊司令厲文禮被俘投敵。二十五日第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率全師七旅投敵，計有三八一旅旅長趙天時、三八二旅旅長任蘭圃、三八三旅旅長薛豪平、獨立第一旅旅長潘勝富、獨立第二旅旅長蘇景華、獨立第三旅旅長張海平、獨立第五旅旅長蘇振東及一二八師參謀長李德興；同月（日期不明）第三五一旅旅長吳淑泉、一一三師師長韓子乾被俘投敵。

第八批將領投敵

三月十三日，東條訪寧，在這一月裏，有第六戰區挺進軍總司令兼第二縱隊司令金亦五率全部投敵。

汪逆九拉

十五日，汪逆爲東條訪寧，對記者發表談話稱：「如果重慶方面民心向我，則問題已解決大半，他們對我們的和平運動，曾經半信半疑，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和平運動步步前進，中國能這樣達到獨立自主，他們即將衷心向我，此點我甚爲樂觀。」（按：「中國之運命」對抗日輕描淡寫，強調不平等條約廢除後中國已經獨立自主，與汪逆觀點如出一轍。）

三「中國之命運」出版後，抗戰團結之危機表面化，

同盟社讚揚該書「論述方向有沒錯誤」

蔣介石與密使陶希聖合作出版「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與曾經參加南京漢奸群的汪派親日份子陶希聖合作的「中國之命運」於本年三月中旬出版。照理，該書對當前抗戰問題應多所闡發，對國家民族應有所貢獻；不意一察內容，自首至尾逐字逐句，無處不是虐殺民族生命，斷送國家前途的有害言論，而成爲對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宣戰書。不僅如此，該書全部與日寇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要求相一致，一字一句均在替日本法西斯說話，日寇要蔣介石停戰，「中國之命運」對抗戰的具體辦法便無一字提及；日寇宣傳中日同文同種，中日滿共存共榮，該書便提倡所謂民族血統論與民族同化論；日寇要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該書便贊美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日德法西斯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該書也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作了希特勒，東條英機的應聲蟲；日寇要求共同防共，該書便提出兩年內解決內政問題，進行反共並謂這是命運的決定關頭；日寇及傀儡政權提倡復古守舊，尊孔，加強保甲，「中國之命運」也一模一樣的主張恢復封建制度，照敵寇和偽政權所提倡的，照抄，逼；日寇反英美蘇，該書便從國恥的由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致此伐與抗戰，一切論點，是反對英美蘇的；日寇提出「對華新政策」、

歸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實行所謂「取消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之命運」也。認爲廢約後，便沒有對外問題，民族主義已經完結了。無怪乎同盟社讚揚此書，稱之爲「論述的方向沒有錯誤。」茲將同盟社：「中國之命運」原文摘錄一段如下：同盟社東京七月十三日電稱：「……：『中國之命運』一書，如果說其論述之方向確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只重複了已爲富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此書之價值，僅在於所寫的蔣介石自供了這些東西，以及自己將對其自己不幸的預言書，公諸世界。最近由於棄「抗戰」之方針，變到交手「觀戰」，此事證明四億五千萬的民衆對於「中國命運」有正確的判斷，當民衆知道「抗戰的英雄」是漢奸，而被稱爲漢奸的人物是「建國的偉人」，觀戰向那一方向發展就可以明白了。」

四吳逆開先投敵後飛返重慶，敵渝兩方共同保護，

諱莫如深。

四月初，吳逆開先離滬，於五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安然飛返重慶，朱家驊、潘公展、張爾友、程滄波、蕭同蕪、杜月笙等百餘人，均赴機場歡迎。三四日後，蔣介石親予接見。

吳開先帶回的秘密條件——第三次條件

據陳果夫談：「此次吳或有和平條件携來」。事後得悉：「吳行前，敵參謀小林少將會

爲之送別，強調日本對重慶遲早必化敵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蘇。今日蔣汪政權獨立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且日本可強制德意法相繼實行，現在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是空談，日本則是拿具體事實來昭示中國人，吳則允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吳逆開先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九三九年奉命留滬港一帶活動。四〇年三月十八日曾在港一解釋憲施憲政問題，望嚴重警戒，慎勿爲人利用。」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吳尙留滬，上海租界爲敵侵佔後不久，吳逆即被捕投敵。此次返渝前，於「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之間，僕僕寄滬道上」，不知所幹何事。四月初奉敵命由上海坐飛機到廣州灣，再轉重慶，於五月七日抵渝，下飛機時，卸下吳逆行李計有大箱子四個。中央社及中央週刊爲掩護吳逆回渝談判和平及進行第五縱隊活動起見，於吳逆離滬前後，曾多次爲吳逆辯護吹噓，中央週刊四卷三十七期說：「汪精衛派汪文問吳開先除自殺外尙願走第二條路否？吳答，做和尚。」寧夏日報去年七月三十日更稱：「吳已被敵送到杭州某寺受戒爲僧，但仍有僞警監視。」不料吳逆此次回渝，否認其事。中央社的消息說：「迄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敵僞綁架，百計誘脅，吳氏本革命信仰，堅貞報國，終不爲屈。」但是究竟怎樣「堅貞不屈」却沒有下文。而吳開先自己却說他被捕後丁默村曾去看他，敵人又要他見汪精衛，他也見了，汪還對他說汪是與蔣演雙簧。汪逆與丁逆默村究竟說了甚麼，姑置不論，但是汪精衛，丁默村爲甚麼一定要看他？日本人爲甚麼又一定要他們相見呢？而且既然百計誘脅，終不爲屈，和尚一說，又已破產

，爲甚麼也就算了呢？據陳果夫說：汪對吳是殺之無用，不如釋放。然而吳開先既是國民黨中組織部副部長，蔣介石派往上海，「奮鬥多年的堅貞革命家」，爲甚麼殺之無用，輕易的就釋放了呢？至於日寇方面七月十七日同盟社上海電訊，曾將延安民衆要求審判吳開先一節改爲「要求重整抗戰陣容」，至今沒有提過吳開先的事，這對吳開先是敵渝兩方都要保護的重要幹部，又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証據。

敵寇派密使赴港談判以「日寇『撤兵』中國反蘇反共」

爲條件進行媾和

卡港會議以後，蔣介石對盟國戰略計劃頗表不滿。此種情形一直到今年羅邱五次會談迄未稍變。（按；五次會議後至最近魁北克會議前亦復如此）

日寇第二個密使

日寇深悉此點，遂於今年二三月展開和平攻勢，一方面派吳開先從南方回重慶，（汪逆於四月初離滬首程）一方面在北方與戴笠的特務接洽，並即引見日寇駐華北的總司令後，又赴南京見畑俊六的參謀長，到上海面晤日寇的海軍總司令，並在南京還會晤過重光葵，敵僞們一致要他向重慶勸駕，勸蔣介石與日本妥協，其建「亞州和平」

日寇提出第四次講和條件

敵海軍係着重南反英美，陸軍係着重北反蘇共，當時提出的初步條件是：一、若將接受可撤退武漢，廣州，便於蔣從武漢、廣州派軍北上剿共；二、南京與濟海等地暫歸日本掌握；三、劃華北爲共同剿共區；四、至於汪的去留很好解決。當條件提出時，正當東條訪寧（按：東條訪寧在三月十三日），並隨後又訪滿洲，表示支持汪偽政權。因此戴笠的特務問支持汪偽政權是否與以上條件抵觸？他們回答毫無影響，結果該特務於吳逆開先首途返渝前後，同時亦啣敵命秘密回渝。他們一個是復興；一個是O O，一個秘密奔走，一個公開幹旋。

漢奸特務紛紛返渝

不久，上海、平、津一帶的特務，也在日寇允許不洩漏日本機密的條件下，紛紛返渝。因此重慶市上妥協空氣大盛。

『鄂西大捷』之內幕

正當此時，湖鄂西戰起，當戰時趨於激烈時，蔣介石把四二年春電黃旭初「暫時看管，秘密談判」的黑田浪人接到重慶，而吳開先也湊巧於此時不見了一個時期（當時有傳說到成都「養病」的），而戴笠的特務與日寇也約有通訊辦法，不久黑田離渝沿江東下了，跟着日

寇也撤兵了，於是重慶官方宣佈鄂西大捷，並吹噓奧斯大林格勒大捷和北非的勝利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

汪蔣特務機關之合流

(註) 按國民黨特務與汪逆特務是互相「統一」與「轉化」的：(一) 汪記特務大頭子丁默村(曾為汪特務工總部主席)、李士羣過去都是二陳手下的反共健將，彼等曾向復興黨表示保奉二陳命充當汪之幹部，二人與重慶方面黨政要人之來往既宏且廣。(二) 曾任汪特工部副部長的章正範過去是潘公展的親信。(三) 魯恩曾派赴青島工作之胡均鶴投汪後，在李士羣的調查統計部任廳長，並負蘇州消鄉區特工之責。(四) 吳開先特工系統之徐綠丞投汪後，曾在港負責審查去滬工商人物。(五) 戴系天津特工負責人戴笠的舅子王子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投汪後，專任華北特工區區長。(六) 戴系在港活動之王新衡於一九四二年投敵。(七) 山西國民黨省委李猶龍在一九四一年中條山被俘投敵後，在太原幫助敵人積極反共，後仍回渝，最近國特中調局已任其為陝西調統室主任。(八) 吳開先(見前)。(九) 國特督察豫邊室主任李郁才隨龐炳勳投敵，但同時又與徐恩曾保持聯系。(十) 亦做汪逆特務情報工作的周佛海、陳彬龢與戴笠有勾結。(十一) 汪系特務之重要份子如汪曼雲、蔡洪田、張瀛曾、劉雲等均為CC份子。汪曼雲原為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候補執委，投汪後，為蘇南清鄉委員會副秘書長。蔡洪田原為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書記長，投汪後，為偽上海特別

市黨部主任委員。張瀛曾原爲上海特別市黨部調查室主任，投汪後，任書記長。劉雲原爲蘇州反省院長，投汪後，任特工總部第四處（情報處）處長。

六 降將如毛，降官如潮，緣在高級指揮機關密令於先，

政府當局公開爲之辯護於後。

敵僞號召軍隊投降

四月十九日，鮑逆文樾發表「告重慶將士書」略謂：「諸君之抗戰已經六年，諸君的忍耐與犧牲已付之一炬……中國如果沒有日本，則必受英美之壓迫……我們必須決定是依靠抗戰以求死呢？還是參加全面和平以求生呢？……」

第九、第十號將領投敵

二十四日，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蘇北游擊縱隊第二支隊司令張良才率部投敵。

五月十一日，僑山西新民報社論「爭取民衆來歸首在保民」，提出需要使民衆來歸的條件：（一）確立治安；（二）減低物價；（三）剿共自衛。末後並稱：「六年以來，重慶治下諸有識之士，漸感前途暗淡，亦認識中日宜友不宜敵之真義，於是憤慨者消極者日漸增多。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號召，如此當然使淪方人民渴望王道天下之心愈切……」

第十一批將領投敵戰區副司令長官投敵

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與孫殿英聯名通電投敵叛國。龐孫所部隨龐孫兩逆投敵將領計有：第二十四集團軍參謀部長趙星彩、一〇六師師長李震汾、冀察戰區挺進第四縱隊正副司令侯如墉、于光輝、參謀部長楊志希、新編第五軍副軍長楊汝賢（楊明清）、參謀長馮養田、暫編第三師正副師長楊克友、王遂慶、暫編第四師正副師長王廷瑛、王瑞亭。

龐孫曾受密令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在龐逆未投敵前，本年三四月間，曾奉重慶與洛陽雙重命令，準備一切進攻八路軍；龐部少將參謀長趙星彩說：「四月二十日以前，龐、孫的軍隊還在一意的進攻八路軍，並且認為日軍已經出動，共同配合着進攻八路軍防地。」四十五師中校副官主任譚敬奇投敵後也供認：「二十四集團軍進駐晉豫邊境，所奉的密令就是反共第一抗戰第二。」

國民黨爲龐逆大辯護

龐逆投敵後，國民黨中央社五月十八日電還在爲之辯護稱：「軍委會發言人談：此次太行山之戰，……龐總司令炳勳率少數特務部隊與敵周旋，歷三日夜，不幸傷腿被俘。龐氏現

時一再××，均爲敵寇所未能屈，矢忠矢勇，剛強堅貞。不意無恥敵寇；代捏種種說話，欺壓國人，在昨日敵寇廣播中，大吹大擂，洋洋千行，一若確有其事者。……「面屬逆隨即以『晉冀魯豫剿共總司令』兼『和平救國軍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的頭銜呈現於敵僞的陣營中，並將其叛軍組成第二十七第四十及新編第五等三個軍及三個直屬獨立旅。六月七日，中樞紀念週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情形亦稱：「敵人宣傳我孫軍長魁北及廳總司令炳勳所部約七萬人投敵事，完全爲其欺騙民衆與其伙伴並德意之虛僞宣傳，意在掩飾其在瓜島、阿圖島之敗績。……」十七日，僞甯宣傳部長林逆柏生發表談話稱：「希望渝方全體將士善體和平運動及對英美宣戰之旨趣，從速改圖。……」十八日，僞甯陸軍部長葉逆蓬發表歡迎劇逆演說稱：「我們決不能對不妥協主義的共產黨妥協，……我們的主席決定了和平反共建國的國策，這實在是挽救中國的鐵案。對日和平的理由甚多，毋庸贅述。即單以反共而論，更必先行對日和平。惟先行對日和平，始能迅速反共。如欲迅速反共，必即行對日和平。……我們既歡迎廳更展將軍和他的麾下將士，我們更盼望渝方有識同慮的將士，一齊復員，都站在和平反共大旗之下。……」十九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荻發表歡迎廳逆談話稱：「廳炳勳將軍脫離重慶，信賴友邦日本，……此並非限於廳將軍一人，相信現下重慶政權下之軍隊，大半皆呈若是之動搖現象，……廳將軍合作後，相信必有繼之而起者，對彼等之義舉，我方必虛心致敬而容納之。」

第十二批將領投敵

同月（日期待查）山東保安第五師師長齊子修、保安第八旅旅長邱吉勝被俘投敵。

第十三批將領投敵

六月六日，蘇魯戰區魯南第一一二師副師長兼第三三四旅旅長榮子恆率全部投敵。

七 敵朝日新聞論重慶動向與周逆佛海的「七七」

誘降聲明

利用國民黨反動派依靠外力的錯誤思想敵偽大肆誘降

東京朝日新聞七月二日關於大陸作戰之新階段報稱：「……重慶現在完全呻吟於窮迫之深淵，……前此時駐英大使顧維鈞夫人曾於紐約稱：若此際英美不徹底援蔣的話，則重慶之對日武力抗戰不知將何致崩潰，果如斯，則美英將失去攻擊日本之重要立足點。又最近重慶當局對駐紮地之美通訊記者竟出以威嚇之詞，拚命努力於強化援蔣之苦訴稱：「若不迅速援助重慶，盡力於太平洋作戰的話，則重慶或將脫退反軸心陣營亦未可知。基於軍火租借法，美國向反軸心國提供物資，而美國為援助重慶而輸送之物資，只不過佔其提供各國之百

分之一而已。……」

周逆佛海亦於七月二日發表「七七」誘降聲明略謂：中國（按指偽寧）向英美宣戰以來，日華兩國關係日益緊密，汪主席闡明中國與日本同生共死之決心，……以前中國人中間也有對日本誠意抱着懷疑的人，但是實現之事態消除此種懷疑，使其絕對相信日本政府之誠意，在此重大之時機，日華兩國人民對於誠意舉措，均必須有正確之認識，……中國必須認識日本實踐其政策，完全是自動的，而且是出於如意與誠意，而不能誤認日本在政策上不得不採取新政策。……日本亦必須認識此次採取的對華新政策是樹立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決不是欲將重慶拉入和平陣營之一種謀略。……吾人深信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失去了抗戰之名義與理由，抗戰行爲決不能長久的繼續下去。因此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亦將促重慶停止抗戰。但是此事只是許多條件中的一個，決不是唯一的條件，欲實行日華全面和平，就必須克服各種困難，余特別率直的以此忠告日華兩國人民。」

八 國民黨企圖發動內戰，準備投降的嚴重危機，

該黨戰區各地特務機關進行「曲綫」辦法，

通敵反共証據確鑿。

國民黨反動派 使托匪頭子準備反共內戰輿論

六月十二日，西安勞動黨訓練處長復與社特務頭子漢奸托匪張滌非召開九個人十分鐘的會議，張滌非主席，宣佈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打擊中共，我提議打電報給毛澤東。張特務頭子當從衣袋內取出其預製之電文，內容首述第一歐戰第二次國際解散，第二次歐戰第三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次述第三國際解散為加強盟國團結，中共應解散以加強中國的團結。到會者懾於特務威風，不敢說話。當時張滌非說道：此稿應即送有關各機關簽名，五天內不答覆者，即為默認。該會偽造民意，共閱十分鐘，被邀者三十餘團體，但到會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風日報、華北新聞、工商報、三晉團讀者導報、圖書審查會各一人，此外有李燕、王孫高、李菴等人，則均係CC特務頭子。

大兵撤離河防準備閃擊邊區

十八日，第×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之後，河防軍隊紛紛西調；（按：五月十一日國民黨第九十軍五十三師已撤離河防，由韓城開抵洛川。五月十三日，第一軍一六七師亦撤離河防由大荔到邠縣）。二十八日，第十六軍炮兵團第一營由邠陽開耀縣。三十日西安僅有之衛戍部隊第五十七軍八師開抵同官。同日河東游擊縱隊王裕民部渡河西撤，開抵大荔，整裝北上。

七月四日，朱總司令致電蔣介石，呼籲團結，避免內戰。六日中央通訊社，竟發表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坐談會，討論國際局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產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電文於當日發出」。同日，國民黨第九十軍六一師撤離河防（並無部隊接替），開抵洛川東南塢台鎮。第九十軍二八師撤離防河，由邵陽開抵洛川南之交口河、橋子鎮。第八十軍直屬隊由耀縣進抵同官。第八十軍新編二七師由富平開邊區囊形南境莊里鎮口頭鎮之線。重炮第二團三營由河防陣地撤抵耀縣。第一軍直屬隊七八師由華縣開抵 縣。所有新增部隊，均已全部換上盟國幫助中國抗戰的新武器。同日，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致電各將領，呼籲團結，反對內戰。七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對邊區警備部隊第一次炮擊。九日，關中分區防軍已受胡軍炮擊，並有九路大舉進攻之訊。朱總司令支電蔣、胡，請予制止。同日，延安民衆三萬餘人，舉行抗戰六週年紀念大會，發出關於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

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反共投敵的鐵證

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企圖發動反共內戰，以準備投降，同時爲了反共又與殺人進行勾結，「投降需要反共，反共必須投敵」，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路線和行動方針。茲僅據新華社太行八月十二日電訊所報導國民黨特務機關通敵反共的確鑿證據，解放日報八月十五日爲之披露，略謂：「據所獲之國民黨內反動派文件，再度獲得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華北敵後一

貫通敵反共的鐵証，他們處心積慮要「逐次消滅與打擊」共產黨與八路軍，他們寧願做所謂投敵的「曲線」，以多方阻撓共產黨八路軍在敵後的抗戰，甚至連謀些主持正義堅持團結抗戰之友軍亦在他們分別「解決」之列。以下即係文件之一部：第一，洛陽××致李旭東（師長——駐冀魯豫）一電有謂：「爲保存太行區與後方聯絡，着令冀魯豫邊區各游擊部隊應即發動游擊，協同動作，以便逐漸消滅與打敗奸偽（指八路軍），並防其西竄。」第二，李旭東、王國瑞（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邵高級參議）等呈請××電內稱：「除奸至爲迫切要務，應分別輕重，首先從事剿共，如影響抗戰，萬不得已則可略走曲線」。第三，王國瑞致李旭東函稱：「對將來之大事中，較有利之時機已至，望兄須放大胆去作。」函內並提示許多辦法謂：「望速與殿公（係孫逆殿英）接洽，要求一個軍的名義，要將集結地點選定素稱險惡之地，對其他不願歸我之小部武力，則應分別解決之」。

太行國民黨特務大肆放毒

又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國民黨特務份子勾結敵偽奸細，乘本區災荒嚴重，在各地製造種種謠言，破壞我生產抗戰力量，近更在各地散放毒藥，左（權）武（安）交界大羊角一帶，連日發現中毒事件多起，盤回村日前有一家全家中毒：頭痛腹痛甚如刀割，當場即死二人，其他經附近醫院救護，尙未完全脫險。據捕獲之放毒奸細供認：係國民黨特務份子所遣派，並受過敵人專門訓練，放毒花樣繁多，除水井水缸外，瓜菓菜蔬亦爲放毒目標……。

九 八月份內敵寇三次公開誘降國民黨當局默不作聲

八月一日合衆社倫敦急電：海通社北平電：東京日本大本營陸軍報導部長谷荻少將對庸報記者稱：倘中國同意停止抵抗，參加反英美之統一戰線，則日軍將由中國撤退。倘重慶停止抵抗，中國將恢復和平，並獲得獨立。日本將以撤退日軍，承認中國之獨立。十三日同盟社東京電：外交雜誌世界週刊八月號以「英美之英美觀」爲題，其中論及「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覺悟反省」稱：「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自「抗戰」向「觀戰」轉移的極應注意的趨勢，這可以看做是重慶的一個深刻反省，亦可以看做是對美國的一種惘懣。最近重慶有一種極應注意的趨勢，就是他們正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亞洲人」的立場上而深刻反省，這是在對華新政策實行後，才理解到日本的「民族解放政策」的一種趨勢。……在蔣介石近著的「中國之命運」的第八章中曾稱：「中國的命運是在全中國人的雙肩上」，連一句話一個字亦未談到要依靠美國或依靠英國。」十八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荻少將再次發表誘降談話，略謂：「英美完全不承認重慶這一戰爭中的努力」，「重慶被侮辱」，「重慶無物可得」，「重慶人士應重新認識今天的實際情形，無論任何時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騙，切勿一錯再錯，應覺悟到目前是在英美的桎梏之下，只有現在才真正是參加解放大東亞戰爭的時候。」十九日，敵大東亞相青木到達南京，對「日華記者團披歷對推進對華新政策之所見。」二十日，延安觀察家認爲：日寇誘降活動已達積極化之階段。國民黨的動向

更值得注意。日寇誘降的猖獗，乃是由於國民黨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尤其是今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製造大規模的內戰，日寇認爲有機可乘，誘降策動日益積極化，中國人民與蘇英美盟邦見此危機，不得不大聲疾呼，指責國民黨錯誤，以冀引起覺悟，所有改正。乃國民黨毫無改弦更張之意，反而怙惡不悛，對人民的正義呼聲，則充耳不聞，高壓如故。對盟邦的靜言，則面紅耳赤，加以「駁斥」。但對八月一日敵會谷荻的誘降談話，迄今半月有餘，反而決無一句駁斥之辭。這種情形，就使日寇揚揚得意，企圖進一步實行誘降，故又發表了十八日的誘降談話。二十七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荻發出最近（一個月內）第三次公開誘降廣播稱：「……重慶還是採取英明的決斷，自己取消其存在，或是日本進兵抹煞存在，這是現在大東亞剩下的最大課題。中國是我們的兄弟，我們對重慶不願以進兵演成流血慘劇的手段來消除它，而是希望重慶由迷夢中清醒，迅速脫離英美，而歸返東亞。至於歸來以後的問題，可以作爲內政問題，於談笑中解決之。我們希望重慶勇敢的下決斷。」二十九日，解放日報社論中論及敵寇八月內幾次誘降稱：「幾年以來，奇怪的事多得很，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八月以來，敵寇軍部發言人頻頻誘降，國民黨方面居然無一字駁斥。說國民黨很忙麼？那麼現在大後方正在大事尊孔，幾乎一切要人都動員了，爲甚麼他們有那麼多空閒時間去尊孔呢？說他們很客氣從不「危言厲色」麼？爲甚麼對於盟邦人士的善意批評却臉紅耳赤，立即駁斥呢？說他們專吃閒飯，不肯做事麼？爲什麼反共就反得起勁，把青年特務化的夏令營什麼營就辦得起勁惟獨對於這件事毫不起勁呢？想來想去，益發令人

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們看起來很懷疑，懷疑國民黨反動派是否真正要當秦檜？所以對日寇的公開誘降不敢駁斥，面默認下去哩！」

十 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引起盟邦輿論界的嚴重不滿，

國民黨當局仍不虛心改悔。

國民黨反動派之消極抗戰及專制獨裁政策，引起盟邦輿論猛烈的批評，甚至曾在中國多年並對蔣介石夫婦一向有好感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最近亦在美國銷路最大的「生活」雜誌上著文題為：「關於中國的一個警告」，尖銳的指出中國的抗戰已不復是一個人民的戰爭，中國軍隊已在腐化，其對敵人的抵抗已趨微弱。中國政府並可能墮入親日派之手。作者更直接批評中國政府：「政府中的高壓者比以前更加高壓了，重慶是一個自由言論一天比一天更少的可能的地方，要想自由的人們，都跑到別處去了，高壓的勢力甚至一直伸張到蔣委員長的家庭中。」在軍事方面，賽珍珠指出：中央軍與八路軍不合作的危險性，他說：「蔣委員長周圍勢力使現在決不應分裂的這兩支人民大軍趨於分裂，中國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內戰的。」紐約的最大日報——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亦掲載長篇評論，批評中國當局之抗戰不力及發動內戰陰謀。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鮑爾溫於七月二十日發表論文，猛烈抨擊中國當局對日抗戰不力，鮑氏並於擁有五千萬讀者之美國銷行最廣的「讀者文摘」上指摘：「過去二年內，

日軍沒有消耗多大兵力即佔領了很大地方，雖然受到重慶軍隊的反攻，但均被擊退。爲了明瞭重慶的軍事真相，專看重慶的公報是很困難的，蓋重慶的公報常常一半是假的，並且報告沒、戰鬥的戰報，或將游擊隊的戰鬥大肆宣傳。」紐約時報又掲載克萊頓、拉西所著之一「中國民主麼？」一文，內稱：「中國還沒有民主的政治機構，例如憲法、代議制政府、國會、普選權、多黨政府。」拉西稱：「蔣介石是戰時的獨裁者，同時在國民黨中法西斯集團至少有兩派。」而遠東問題權威學者畢生氏在太平洋半月刊上更明確指出：「現在中國有兩個中心：一個封建中心，在重慶；一個民主中心，在延安。」在蘇聯方面中國問題專家名記者羅畢夫（前塔斯社重慶分社社長）在莫斯科發表「對於中國政府之批評」的論文，其中對中國之失敗主義者準備投降與企圖發動內戰稱：「……中國軍隊的缺點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統一領導及各戰場的配合作戰，內部的磨擦，諸將領間之猜忌，不能不影響軍隊的戰鬥力和紀律。在重慶固然沒有公開主張投降的人，但是這並不是說那裏沒有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很多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在國民黨中佔據重要位置，他們以他們的消極怠工及有害的政治陰謀，削弱中國的力量，而且在現在成爲一個嚴重的危險。」該文繼謂：「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後，日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太平洋戰爭，中國的戰爭居於次要地位，這使得在中國軍事及政治領袖當中產生某種自滿，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利用此種自滿，來加緊他們的「平和攻勢」……中國「綏靖主義者」的陰謀活動，幫助了日本的這些計劃，他們挑撥各種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

動；……今天用直接的軍事壓力，要求解散中共及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新企圖，已經發生了。」隨後該文續謂：「有些國民黨著名領袖反對各種「綏靖主義者」投降派及挑撥者這種陰謀活動，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堅決克服投降派這種曾在破壞民族團結及削弱中國對日本侵略者之抵抗的活動。」

與此相反，敵寇同盟社最近却對國民黨之消極抗戰政策及「中國之命運」一書大加讚揚，（見前）而國民黨當局對盟邦出之至誠之靜言，竟惱羞成怒，大肆咆哮，張道藩、董頤光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大罵於前，下令所屬報紙攻擊之於後。而對日寇之捧場，竟無一字答覆，似欣欣然有喜色者。據此，重慶當局不僅對內對外政策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之，對日抗戰將愈趨消極，對內高壓更愈來愈兇；對同盟國將更離心離德，而重慶與東京間之關係日趨微妙，此種趨勢，我全國人民及盟邦人士極應密切注意！

（九月一日）

（全文完）

